

以融合促振兴: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郭东,李琳*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摘要 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6—2021年我国1672个县域数据,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U”型非线性特征,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引培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只有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立。此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区域和城乡产业融合类型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县域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的城乡产业融合模式。据此,要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并优化县域金融扶持政策和加强企业引培力度,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差异化城乡产业融合模式。

关键词 城乡产业融合; 县域共同富裕; 企业引培; 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4)03-0051-16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4.03.005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但产业分割,尤其是城乡产业分割犹如挂在我国经济发展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会导致城乡利益分配失衡、收入差距拉大和要素错配程度加深,从而掣肘我国的共同富裕进程。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赋予了共同富裕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共同富裕不仅涉及经济总量的增加,还涉及收入分配和健康公平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和精神富足^[1]。毋庸置疑,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长期工程^[2]。为此,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要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些政策文件从宏观层面为城乡产业融合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外,县域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枢纽,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石,而且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3]。因此,以县域为载体考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但目前,在推进县域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普遍存在产业体系发展滞后、经营主体赋权分散、产业融合结构失衡等问题,导致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低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因此,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城乡产业融合以促进共同富裕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关学者围绕着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以及驱动因素展开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数字经济^[4-5]、产业结

收稿日期:2024-0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共同体演化机制与治理体系研究”(22FJLB007);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融合推动湖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2YBA025)。

*为通讯作者。

构^[6-7]、劳动力流动^[8]、创业活动^[9]、城乡融合^[10]等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县域共同富裕受多重因素影响,但城乡产业融合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究其原因在于:第一,从城乡产业融合的内涵来看,城乡产业融合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产业和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1],其本质是城市与农村在发挥各自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完成相互间的产业对接^[12],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两个地域空间内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13],这样才能厚植共同富裕基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二,从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来看,无论是提高农民收入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还是破除城乡要素流动障碍以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城乡产业融合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关研究表明,制度保障^[14]、要素流动^[15]和数字化进程^[16]是加快构建城乡产业体系,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第三,从当前共同富裕发展阶段来看,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的缩小有赖于城乡产业融合,其着眼于经济量与质的提升相协调^[17]。实际上,产业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而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县域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在于振兴县域产业^[18]。

现如今,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正在重塑城乡间与产业间的组织形态和发展格局,并成为驱动县域共同富裕的新动能。尽管学者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了城乡融合和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并考察了二者的影响因素^[19-20],但尚未有文献直接涉及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仅有少数几支文献采用省级数据从收入差距^[21]、人口流动^[22]和城乡互动^[23]等视角解读了城乡融合和农村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然而,上述研究始终未能揭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同时也忽略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将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与共同富裕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探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这是对现有文献研究视角的补充。其次,本文从企业引培和融资约束破解两个维度阐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识别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影响,拓展了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最后,本文基于2006—2021年我国167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与共同富裕水平,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关键的县域证据支持。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是鲶鱼效应。竞争激励是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而城乡产业融合正在以“颠覆性”的激励手段重塑城乡产业发展格局,助力共同富裕。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在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县域产业间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这不仅有助于激励农户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还会促进农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提升,完善农村营商环境,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二是长尾效应。农产品加工度和附加值较低,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绝大多数都属于大众化产品,虽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能够实现的产值有限。然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能够帮助经营者有效获取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信息,挖掘处于长尾部分的潜在客户,而且使产品多样化生产成为可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助力经营主体获取“小利润、大市场”带来的产值空间,推动县域共同富裕。三是规模效应。长期以来,农村产业结构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落后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经营模式导致农业生产受限,极大地阻碍了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县域共同富裕进程。然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不仅能够在新产品的渗透融合下催生新产品和新服务,进一步扩大需求市场,而且能够通过产业间的互补和产业链延伸降低企业规模化生产成本、组织治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推动县域共同富裕^[24]。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初期,其处于被动融合阶段。其中,城市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和计划安排,农村则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生产和国家支农政策,而且这一时期县域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导致农村产业基础较为薄弱,难以吸引城

市资源流向农村,阻碍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不断深化,农村生产环境、产业基础和惠民政策得以不断完善,这会吸引更多的城市资源流向农村。在这一时期,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是由城市和农村主动互动和融合推进的,如城市向农村输送资金、技术和人才,农村向城市输送高附加值农产品,这可以有效推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留在农村,实现富民增收的目标。由此可见,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

假设1: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

假设2: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正U”型特征。

2.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1)企业引培机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引培来推动县域共同富裕。长期以来,农村固守着传统第一产业,中小微民营企业年龄小、规模小、融资能力差且技术水平低,种植大户普遍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从而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桎梏^[25]。然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破除了企业引培的路径阻碍,从而成为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带来的产业协同发展将有助于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和高效率的就业分工体系,缩小企业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从而加快企业引进速度,推动县域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有效延伸农业产业链,激发诸如“淘宝村”、“电商带货”、“服务型农业”等新型行业的快速发展,而新兴行业的涌现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通企业引培路径^[26]。而企业引培力度的增强提高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从而在深化区域分工协作并提供大量新型就业岗位的同时,激励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创业活动中来,助力农民增收。此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带来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创新意味着资源要素的整合以及生产分工的细化,有助于促进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链延伸,这势必会吸引大量企业的入驻,从而增加农民收入^[27]。然而,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初期,城乡之间的联系较为分散,企业往往集聚于城市,这来源于城市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丰富的人才和信息等资源以及完善的市场体系。而县域的农村地区则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和交通不便利等条件约束,导致企业引培的效果差强人意。随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城乡之间的双向流通渠道被打通,改变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的格局,从而推动企业下乡并带动农村生产生活质量的提升,进而助推县域共同富裕。

假设3: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引培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受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2)融资约束破解机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作为城乡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有助于形成融资约束破解机制,从而赋能县域共同富裕。农村金融资源受城镇虹吸效应和金融机构分布不均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稀缺状态,这是制约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主要阻碍^[28]。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为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契机。一方面,随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度的提升,依托政策便利和金融扶持,其势必会提高农村金融资源的供给,弥补县域金融的短板和缺位,破解融资约束,提高各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可得性,从而助推县域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和倍增剂,能有效优化企业资金配置,并加快农村财富积累。具体而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有助于推动物流技术、管理方法、组织方式、运营模式的创新发展,在整合资源、优化流程的基础上,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产业和行业之间发展更加协同^[24],从而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最终赋能共同富裕。然而,金融具有逐利性与集聚性特征,这导致在县域金融服务发展初期,金融资源往往流向或者集聚于发达的城镇地区,致使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金融排斥。一方面,这会导致欠发达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金融资源约束,从而难以有效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金融排斥将会抑制农村地区的就业创业活力,从而扩大三大收入差距,抑制县域共同富裕。随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金融支持农村发展的力度逐渐增强,尤其是依托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打破了金融惠农的时空约束,这极大地拓展了农民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和增强了金融可得性,从而缓解了县域城乡产业

融合赋能共同富裕的融资约束。

假设4: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受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县域共同富裕的机制框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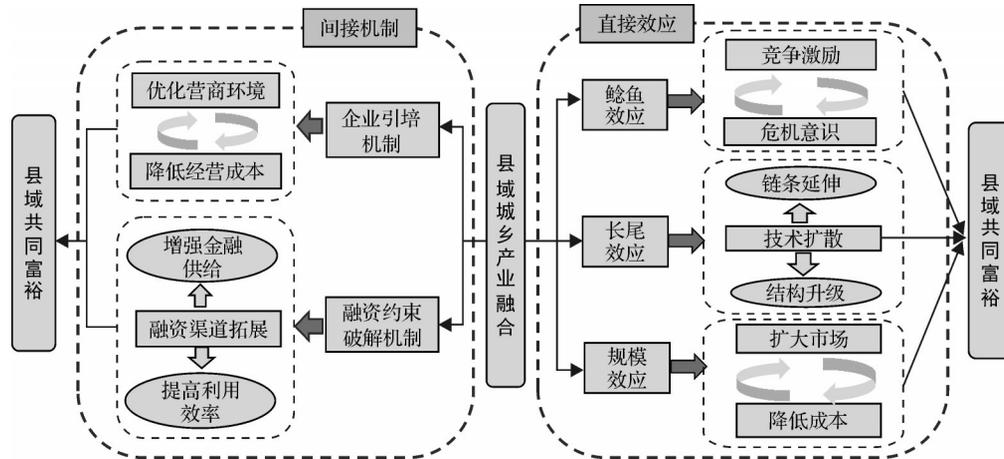


图1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县域共同富裕的机制框架图

二、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

为检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非线性门槛效应模型,如式(1)所示:

$$Copro_{it} = \eta_0 + \eta_1 Fusion_{it} (Fusion_{it} \leq \gamma_1) + \eta_2 Fusion_{it} (Fusion_{it} > \gamma_1) + \eta_3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考虑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可能存在多个门槛,本文在单门槛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为双门槛模型:

$$Copro_{it} = \rho_0 + \rho_1 Fusion_{it} (Fusion_{it} \leq \gamma_1) + \rho_2 Fusion_{it} (\gamma_1 < Fusion_{it} \leq \gamma_2) + \rho_3 Fusion_{it} (Fusion_{it} > \gamma_2) + \rho_4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在上式中, γ_1, γ_2 为门槛值。 i 表示县域, t 表示时间, $Copro$ 表示县域共同富裕水平, $Fusion$ 表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 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mu, \lambda, \varepsilon$ 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通过上文理论分析,本文发现企业引培(EIT)和融资约束破解(MFC)是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为验证二者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与共同富裕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温忠麟等^[29]的中介检验方法。

考虑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来考察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原因在于空间杜宾模型(SDM)不仅能识别变量间的空间相互关系,而且其模型结构具有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同时纳入考察范围的优势。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Copro_{it} = \phi_0 + \phi_1 \sum_{j=1}^n W_{ij} Copro_{it-1} + \phi_2 \sum_{j=1}^n W_{ij} Copro_{it} + \phi_3 Fusion_{it} + \phi_4 \sum_{j=1}^n W_{ij} Fusion_{it} + \phi_5 X_{it} + \phi_6 \sum_{j=1}^n W_{ij} X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varepsilon_{it} = \omega \sum_{j=1}^n W_{ij} \varepsilon_{it} + \phi_{it} \phi_{it} \sim N(0, \sigma^2 I) \quad (4)$$

其中, W 为 1672×1672 阶的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原因在于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假设空间效应不仅只存在于相邻的空间单元之间,有些县域即使不相邻也存在着空间效应,且县域之间距离越近,这种空间效应就越强。

2. 变量选择

(1) 县域共同富裕指标选择。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契合单元。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特点^[30]。首先,推进县域共同富裕需要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打造高能级产业体系,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夯实县域共同富裕根基;其次,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渠道,带动县域投资,释放县域消费潜力,从而形成驱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动力。最后,推动县域共同富裕,亟需增强县域普惠力度和提高县域现代化治理水平。县域作为乡村振兴主战场和共同富裕主阵地,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交汇点^[2],其发展不仅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还影响着整体发展的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30]。因此,本文从经济实力、发展动力、共享程度、服务普惠和社会治理五个维度,构建了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表1),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进行测度。

表1 县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基准层	要素层	指标选择	属性
经济实力	发展水平	县域人均GDP	正
		县域人均财政收入	正
	产业升级	县域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	正
		县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正
		县域产业结构	正
发展动力	投资消费	县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正
		县域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正
	创新创业	县域农业科技企业数	正
		县域农业机械化水平	正
		县域新注册企业数	正
共享程度	区域均衡	县域人均GDP地区共享	正
		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共享	正
	城乡协调	县域城镇化率	正
		县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负
		县域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正
服务普惠	群体包容	县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正
		县域电商企业数	正
	基础设施	县域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正
		县域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正
		教育医疗	县域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长率
社会治理	社会保障	县域每万人拥有中小学在校学生数	正
		县域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正
	生态环境	县域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正
		县域单位GDP碳排放	负
		县域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	负

注:县域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三次产业的比重进行加权求和;县域产业结构:(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县域农业科技企业数来源于天眼查。

(2)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指标选择。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不仅体现在融合主体的多样性,还体现在融合动力的多源性和融合过程的复杂性。此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产业链的交叉到重组,再到城乡“一产接二产连三产”的融合发展阶段,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不仅涉及到技术创新、市场需求、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整合等多方面因素,还涉及到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导向、社会保障和环境承载能力等,其影响面广,因素之间的交互较多,这些因素需要在融合过程中得到合理协调,才能实现产业的有机融合。根据以上对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特征的归纳,本文认为,县域城乡产业的融合应该体现在融合状态、融合动力、发展潜力和融合保障。因此,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合理性等原则以及我国县域发展特点,本

文选择了26个指标层组成的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表2),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进行测度。

表2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基准层	要素层	指标选择	属性
融合状态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人均农产品加工企业数	正
		人均农村电商企业数	正
		设施农业面积占比	正
	城镇产业融合状况	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生产总值	正
		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数量比值	正
		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数量耦合度	正
		制造业/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比值	正
	城乡间产业融合	城乡产业协调系数	正
		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正
	融合动力	内生发展动力	技术创新
人才要素流动			正
外生发展动力		资本要素流动	正
		政策导向	正
融合潜力	产业发展潜力	市场需求	正
		制造业区位商	正
	要素整合潜力	服务业区位商	正
		人才要素优化配置	负
		资本要素优化配置	负
		高铁开通情况	正
融合保障	基础实施保障力	移动电话普及情况	正
		公路路网密度	正
	公共服务保障力	银行网点数	正
		医疗卫生情况	正
		教育发展情况	正
		环境承载力	碳排放强度
		化肥使用强度	负

注:城乡产业协调系数: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值与第二、三产业产值增加值之比;城乡二元系数: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技术创新: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政策导向:政府相关网站统计产业政策词频;市场需求:县域名称百度指数。人才要素优化配置和资本要素优化配置:参考相关研究的做法,采用生产函数法计算。其中,制造业企业数、服务业企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数和农村电商企业数来自于天眼查。

第一,城乡产业融合在县域中表现出融合主体的多样性,而且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的主体较多,不同的县域之间的融合状态差异较大。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将城市的先进技术与农村的农产品生产相结合,从而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城镇产业融合、城乡间产业融合这三个方面的融合,进而创造新的价值链和供应链,提高产业附加值^[22]。

第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还表现为融合动力的多源性。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的动力源自于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在内生驱动力方面,产业融合的本质就是在技术创新、要素流动的驱动下,实现产业边界模糊和一体化。外部激励也是一大动力来源。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是推动融合的关键动力,如支持农村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政策。

第三,融合潜力是推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的关键,其主要表现为县域要素整合潜力和产业发展潜力。县域普遍面临着经济总量相对较低、主导产业不强等问题,这促使县域在融合中倾向于通过整合不同产业领域来实现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此外,我国县域发展环境对人才等各类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较弱,降低了要素资源利用率。因此,增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潜力离不开增强对县域产业发展平台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要素资源向县域产业平台集聚。

第四,提升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离不开县城承载能力、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这主要表现为县域基础实施保障力、公共服务保障力和环境承载力。

(3)机制变量选择。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本文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破解机制(MFC)和企业引培机制(EIT)促进县域共同富裕。因此,本文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来衡量融资约束破解机制,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对数作为企业引培机制的替代变量。

(4)控制变量选择。县域共同富裕除了受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加入了如下控制变量。财政压力、消费潜力、对外开放、文体发展程度和网络信息发育度五个层面实施控制。财政压力(*Pre*),以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其值越大,财政压力越大。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强,其势必会影响到政府对县域的财政支持力度,从而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对外开放水平(*Ope*),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对数来表示。对外开放水平会影响到农产品出口和外商投资,从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文体发展程度(*Cul*),选择艺术表演场馆、剧场和影剧院个数、公共图书馆总藏量和体育场馆机构个数三个变量,并采用熵值法对其进行处理来衡量文体发育度。县域文化和体育场馆不仅满足了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也为居民提供了表现舞台,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消费潜力(*Con*),选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对数来表示。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激活农村消费,既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立足点,更是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网络信息发育度(*Int*)。采用移动电话用户数来表示。互联网信息发育度是影响农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其有助于推广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等项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3.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06—2021年我国的1672个县域(不包括市辖区,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县市)。县域农业科技企业数、电商企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数、农业服务企业数以及相关企业数量来源于天眼查,新注册企业数来源于爱企查,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源于中国民政部及各县市统计公报,其余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EPS数据库、《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各县市统计公报、国泰安数据库。对于其余少量缺失数据利用线性趋势法补齐。表3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26752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县域城乡产业融合(<i>Fusion</i>)	0.080	0.035	0.019	0.368
县域共同富裕(<i>Copro</i>)	0.063	0.081	0.011	0.523
财政压力(<i>Pre</i>)	0.630	0.811	0.205	15.717
对外开放水平(<i>Ope</i>)	0.741	0.121	0.000	1.844
文体发展程度(<i>Cul</i>)	0.024	0.036	0.000	0.747
消费潜力(<i>Con</i>)	4.008	1.236	-6.571	7.650
网络信息发育度(<i>Int</i>)	0.330	0.447	0.000	45.599
企业引培(<i>EIT</i>)	3.916	1.365	0.000	7.822
融资约束(<i>MFC</i>)	12.960	1.358	1.386	17.732

三、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分析

在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分别进行了多重共线性、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性检验,尽可能减少回归结果的偏误和伪回归问题。结果显示,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且各变量系统存在协整关系,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①。根据理论分析,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因此,本文选择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考察不同阶段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特征。表6的结果显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本文以表6第(6)列为依据,汇报门槛效应的一系列估计结果。表4~5的结果显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在其自身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并且门槛值分别为0.0171和0.2935。

从表6可以发现,在模型(1)~(6)中,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

① 篇幅限制,留存备案。

表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Threshold	RSS	MSE	F	P	Crit10	Crit5	Crit1
Fusion	Single	272.3502	0.0102	297.89	0.0000	23.6361	29.0455	39.3706
	Double	271.3674	0.0101	96.82	0.0767	58.0504	145.2543	229.7600
	Triple	271.0677	0.0101	29.56	0.7400	100.6076	136.6424	191.9337

表5 门槛值估计结果

变量	model	Threshold	Lower	Upper
Fusion	单门槛	0.0171	0.0169	0.0172
	双门槛	0.2935	0.1501	0.2964

表6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N=26752

变量	(1)	(2)	(3)	(4)	(5)	(6)
Fusion	-1.8562***	-1.8096***	-1.8028***	-1.8163***	-1.6684***	-1.6684***
($0 < Fusion \leq r^1$)	(0.2578)	(0.2572)	(0.2571)	(0.2571)	(0.2526)	(0.2526)
Fusion	0.6961***	0.6934***	0.6888***	0.6804***	0.6587***	0.6587***
($r^1 < Fusion \leq r^2$)	(0.0440)	(0.0439)	(0.0439)	(0.0440)	(0.0432)	(0.0432)
Fusion	0.0664	0.0672***	0.0677***	0.0661***	0.0791***	0.0791***
($r^2 < Fusion$)	(0.0130)	(0.0130)	(0.0130)	(0.0130)	(0.0128)	(0.0128)
Pre		-0.0206***	-0.0208***	-0.0208***	-0.0199***	-0.0199***
		(0.0018)	(0.0018)	(0.0018)	(0.0017)	(0.0017)
Ope			0.0509***	0.0507***	0.0467***	0.0467***
			(0.0104)	(0.0104)	(0.0103)	(0.0103)
Cul				0.0827***	0.0725**	0.0725**
				(0.0303)	(0.0297)	(0.0297)
Con					0.0905***	0.0905***
					(0.0030)	(0.0030)
Int						0.0000
						(0.0019)
Constant	-3.1299	-3.1181***	-3.1526***	-3.1535***	-3.4072***	-3.4072***
	(0.0029)	(0.0031)	(0.0077)	(0.0078)	(0.0113)	(0.0113)
R ²	0.9113	0.9118	0.9118	0.9119	0.9150	0.915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均固定了时间和个体效应,后表同。

影响。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低于0.0171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处于0.0171和0.2935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由负转为正。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高于0.2935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依旧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其中,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0.0171和0.2935之间时达到最大。由此可见,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正U”型特征,假设1和假设2得证。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处于低水平时,城乡间联系较为分散,城市凭借着先发优势虹吸农村的资源并逐渐拉大与农村的发展差距,这导致县域城乡产业融合难以有效发挥富民增收的作用。随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城乡之间的双向流通渠道逐渐被打通,从而有助于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并延伸农业产业链。农村则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和装备彻底改造传统农业面貌并导入城市现代要素,拓展农业的利润空间,挖掘农产品的潜在附加值,提升农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重要地位,助力城乡差距缩小,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当城乡产业融合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0.2935)后,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减弱。原因可能是,城乡产业融合的后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行业竞争,从而会弱化其共富效应,但是其总的促进共富的趋势不变。这蕴含着深刻的政策含义,即要在促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的同时,也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放大“以融合促振兴”的效果。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压力

对县域共同富裕产生了显著的不利影响。消费潜力、对外开放、文体发展程度则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消费潜力的释放、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文体娱乐条件的改善将有助于盘活县域经济活力并提高居民幸福感,从而提高县域共同富裕水平。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五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7:①替换被解释变量。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持续增收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否则不论是“富裕”还是“共同”,都无从谈起^[10]。因此,借鉴林嵩等的处理方式^[9],本文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自然对数作为共同富裕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②缩尾处理。考虑到样本中可能存在极端异常值,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③排除疫情冲击。考虑到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冲击,进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剔除了2020年和2021年的数据,再次进行回归。④剔除极端异常值。鉴于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与副省级城市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与一般地级市存在明显差异^[31],本文剔除了以上城市所辖县的样本,以避免由于这些城市特殊性而导致的结果偏差。⑤内生性考察。本文参考Greiner等^[32]解决门槛模型内生性的方法,对包括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在内的所有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阶处理,重新回归后的估计结果见列(5)。

表7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1)替换被解释变量	(2)缩尾处理	(3)排除疫情冲击	(4)剔除极端异常值	(5)内生性检验
<i>Fusion</i>	-2.4543***	-1.2855***	-0.9466***	-1.5456***	-0.9455***
($0 < Fusion \leq r^1$)	(0.3841)	(0.2318)	(0.2038)	(0.2529)	(0.3044)
<i>Fusion</i>	1.7650***	0.6997***	0.5365***	0.7065***	1.2767***
($r^1 < Fusion \leq r^2$)	(0.1014)	(0.0449)	(0.0488)	(0.0488)	(0.0591)
<i>Fusion</i>	0.2488***	0.0846***	0.0418***	0.0962***	0.4078***
($r^2 < Fusion$)	(0.0281)	(0.0128)	(0.0145)	(0.0136)	(0.01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8.4072***	-3.5762***	-3.4035***	-3.4052***	-4.3132***
	(0.0244)	(0.0134)	(0.0119)	(0.0116)	(0.0099)
观测值	26752	26752	23408	24944	25080
R^2	0.8413	0.9185	0.9040	0.9143	0.8524

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特征,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3. 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企业引培和融资约束破解是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因此,本文进一步将以上两个变量引入模型来验证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鉴于在基准回归中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正U”型非线性特征,因此本文以“正U”型拐点为界限,将样本划分为低于第一门槛值和高于第一门槛值两个区间,以考察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机制路径。

(1)企业引培的机制检验。如表8第(1)~(3)列所示,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低于0.0171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难以通过促进企业引培来促进共同富裕。究其原因可能是,城乡产业融合水平低可能导致农村地区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和交通不便利等条件约束,难以吸引企业投资设厂。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高于门槛值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企业引培的影响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而第(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和企业引培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引培来赋能共同富裕。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推动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带动新型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企业下乡,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畅通“乡—城”和“城—乡”要素流动通道,打破要素市场分割壁垒,降低企业生产和用工成本,打通企业引培路

径。与此同时,城乡产业融合带来的产业协作化能有效优化农村传统产业,发展农村新型特色化产业,构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从而优化农村市场营销环境,助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需要指出的是,做大“蛋糕”和合理分好“蛋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与关键所在,而企业引培正是做大“蛋糕”、激发农村市场经济活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企业下乡能够有效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收益率并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是实现县域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因此,假设3得证。

表8 企业引培机制的估计结果

变量	$Fusion(0 < Fusion \leq r^1)$			$Fusion(r^1 < Fusion)$		
	(1) <i>Copro</i>	(2) <i>EIT</i>	(3) <i>Copro</i>	(4) <i>Copro</i>	(5) <i>EIT</i>	(6) <i>Copro</i>
<i>Fusion</i>	2.9587 (4.3707)	158.5556*** (27.0660)	1.2071 (4.4358)	0.3332*** (0.0156)	0.1896*** (0.0687)	0.3218*** (0.0151)
<i>EIT</i>			0.0110** (0.0051)			0.0600*** (0.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4.0366*** (0.1065)	5.2154*** (0.6593)	-4.0942*** (0.1095)	-4.3685*** (0.0102)	9.0737*** (0.0448)	-4.9130*** (0.0162)
观测值	1327	1327	1327	25425	25425	25425
R^2	0.8979	0.4984	0.8984	0.8481	0.5045	0.8586

(2)融资约束破解的机制检验。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难以通过打破融资约束来促进县域共同富裕。当城乡产业融合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有效打破融资约束,从而助力共同富裕。随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其为县域融资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方面,为满足高水平城乡产业融合对资本的需求,农村会受益于政策倾斜和金融扶持,从而降低农村金融壁垒,扩大农村金融可得性,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这显著降低了城乡发展鸿沟,增强了金融支持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能力。另一方面,城乡产业融合在推动企业下乡的同时,也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组织管理方法,促进产业协同发展,从而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缓解资金紧张。而且伴随着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和企业下乡,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营商环境和产业基础会得到重要改观,其势必会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下乡,加快农村资本积累。破解融资约束难题并加快资本积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保障和路径,比如胡耀岭和徐洋^[33]研究得出,健康投资能够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存在显著的共富效应。而且资本积累存在显著的就业效应、社会效应和分配效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其将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34]。因此,假设4得证。

表9 融资约束破解机制的估计结果

变量	$Fusion(0 < Fusion \leq r^1)$			$Fusion(r^1 < Fusion)$		
	(1) <i>Copro</i>	(2) <i>MFC</i>	(3) <i>Copro</i>	(4) <i>Copro</i>	(5) <i>MFC</i>	(6) <i>Copro</i>
<i>Fusion</i>	2.9587 (4.3707)	7.0048 (14.9694)	-0.1488 (3.7245)	0.3332*** (0.0156)	0.0643* (0.0351)	0.0127 (0.0116)
<i>MFC</i>			0.0784*** (0.0079)			0.1116*** (0.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4.0366*** (0.1065)	9.1299*** (0.4455)	-4.1830*** (0.1321)	-4.3685*** (0.0102)	10.6316*** (0.0340)	-4.5657*** (0.0253)
观测值	1327	1327	1327	25425	25425	25425
R^2	0.8979	0.8387	0.9290	0.8481	0.8674	0.9205

4. 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检验。中国地域广阔且内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差异较大,从而

会导致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考察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县域共同富裕影响的区域性差异,本文将1672个县样本细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样本组^①。表10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小于第二门槛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均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高于第二门槛值时,该影响由正转负,但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处于高水平区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过高其会导致区域间竞争压力增加,从而限制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在两个门槛值两侧,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均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县域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承接地,其产业基础、生产条件较好,能够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有效支撑。在西部地区,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小于第一门槛值时,其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大于第一门槛值时,其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特征。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的屏障地区,在城乡产业融合初期,其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限制了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绿色化和特色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后发优势逐步得到激发和释放,从而助力西部县域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然而,较为特殊的是我国的东北地区,其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这种差异可能源自于东北地区传统产业升级难、资源枯竭地区转型慢、要素资源禀赋不具优势等因素。低水平城乡产业融合阶段对产业结构等条件的要求较低,能有效推动县域共同富裕。随着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东北支撑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健全,从而导致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显著。

表10 四大板块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东部	(2)中部	(3)西部	(4)东北
<i>Fusion</i>	0.7280***	1.5277***	-1.4267***	0.5894***
($0 < Fusion \leq r^1$)	(0.0764)	(0.1929)	(0.3144)	(0.1337)
<i>Fusion</i>	0.1378***	0.9140***	0.5960***	-0.0052
($r^1 < Fusion \leq r^2$)	(0.0219)	(0.0993)	(0.0667)	(0.0381)
<i>Fusion</i>	-0.0435	0.1372***	0.1220***	
($r^2 < Fusion$)	(0.0286)	(0.0244)	(0.02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3.3062***	-3.9849***	-3.3756***	-3.2112***
	(0.0338)	(0.0378)	(0.0195)	(0.0338)
门槛值与置信区间	$r^1=0.1016$ {0.1000, 0.1029}	$r^1=0.0402$ {0.0397, 0.0403}	$r^1=0.0172$ {0.0171, 0.0173}	$r^1=0.0887$ {0.0854, 0.0900}
	$r^2=0.3931$ {0.3825, 0.3958}	$r^2=0.1342$ {0.1205, 0.2961}	$r^2=0.1234$ {0.1151, 0.2195}	
观测值	6720	7552	10192	2288
R^2	0.9278	0.9409	0.9154	0.9224

(2)类型异质性检验。不同县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程度呈现显著差异,从而会导致不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类型呈现差异。因此,本文将县域划分为均衡成熟型、动力追赶型、高速成长型、潜力优势型和融合起步型^②,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从表11的第(1)~(5)列可以看出,高速成长型、潜力优势型和融合起步型县域的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均衡成熟型和动力追赶型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可能

① 其中,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分别有420个、472个和637和143个县样本数。

② 本文采用机器学习中的自组织映射(Self-organizing map, SOM)的方法来对不同的县域进行分类。该方法是数据挖掘中的无监督学习算法,能够较好捕捉到数据结构中的突出特征,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聚类分析问题中。在本文中,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较多,且以全国为尺度的研究县域样本数量也较多,需要在多样本、多维度指标中进行县域类别划分。

原因在于,对于均衡成熟型和动力追赶型县域,其城乡产业融合的发展水平相对稳定,产业基础较为完善,从而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显著而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于融合起步型县域和潜力优势型县域,二者的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综合指数较低,该类型县域的资源条件突出,但其资源容易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吸收。换言之,城乡产业融合程度高的县域率先完成产业链的重构与重组,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对资源的虹吸效应增强,从而对潜力优势型和融合起步型县域的共同富裕产生不利影响。

表11 类型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均衡成熟型	(2)动力追赶型	(3)高速成长型	(4)潜力优势型	(5)融合起步型
<i>Fusion</i>	1.1788***	0.9804***	-2.9056***	-1.4660***	-1.2292***
($0 < Fusion \leq r^1$)	(0.2733)	(0.0796)	(0.7039)	(0.3575)	(0.2774)
<i>Fusion</i>	0.2378***	0.5968***	0.8063***	0.1266***	0.4976***
($r^1 < Fusion \leq r^2$)	(0.0839)	(0.0680)	(0.0985)	(0.0366)	(0.0763)
<i>Fusion</i>			0.2103***		
($r^2 < Fusion$)			(0.03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0.0746***	-3.4621***	-3.8886***	-4.0899***	-3.3748***
	(0.0254)	(0.0295)	(0.0527)	(0.0676)	(0.0134)
门槛值与置信区间	$r^1=0.2144$	$r^1=0.0673$	$r^1=0.0185$ {0.0183, 0.0534}	$r^1=0.0254$	$r^1=0.0172$
	{0.2061, 0.2945}	{0.0672, 0.0675}	$r^2=0.2941$ {0.2930, 0.2947}	{0.0248, 0.0257}	{0.0166, 0.0173}
观测值	672	7344	2784	2448	13504
R^2	0.9384	0.9063	0.9179	0.9275	0.9231

四、空间效应识别与融合模式选择

1. 空间效应识别

根据“涓滴理论”和“外部性”原理的核心观点,率先发展起来的县域可以通过就业、消费等途径,惠及临近县域并带动其发展。换言之,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不仅能够破除城乡内部产业的多重壁垒,消除城乡发展边界^[35],还能改变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辐射带动周边县域发展^[36]。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从空间视角探索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

(1)空间相关性检验。表12汇报了2006—2021年县域共同富裕和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和县域共同富裕的全局莫兰指数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和共同富裕在2006—2021年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换言之,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和共同富裕存在一定的空间外溢效应。

表12 县域共同富裕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的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结果

年份	<i>Fusion</i>	<i>Copro</i>	年份	<i>Fusion</i>	<i>Copro</i>
2006	0.077***	0.301***	2014	0.066***	0.338***
2007	0.068***	0.322***	2015	0.041***	0.329***
2008	0.080***	0.333***	2016	0.050***	0.319***
2009	0.064***	0.322***	2017	0.043***	0.325***
2010	0.063***	0.323***	2018	0.038***	0.295***
2011	0.054***	0.326***	2019	0.037***	0.286***
2012	0.066***	0.321***	2020	0.025***	0.274***
2013	0.061***	0.327***	2021	0.027***	0.276***

(2)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根据Anselin等^[37]给出的相关研判标准,本文分别进行了LR检验、Wald检验和Hausman检验(见表13)。结果显示,本文应采用时间个体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

形式。

进一步地,本文参考Elhorst^[39]的处理方法,采用偏微分矩阵分解的方式重新对空间计量模型点估计的结果进行偏误修正,从而得到准确的空间溢出效应。由表13可知,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在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赋能共同富裕。不容忽视的是,由第(2)列的间接效应可知,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临近县域的影响显著为正。原因在于,一方面,产业具有一定同质化集聚的特征,形成产业融合的县域通常规模较大,产业链条比较完整,具有跨区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特征。同时,相邻地区为吸引优质企业的进入,通常为进入企业在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从而扩大产业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跨地区的要素流动能够在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合作,不同地区都能够获得经济效益。

2. 融合模式选择

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指出,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这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本文将具体探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的模式。

(1)农文旅交叉融合模式。农文旅交叉融合模式以借助城镇成熟的旅游管理方式以及各种要素、资源的投入,带动县域旅游业繁荣兴盛为特点,最大限度挖掘农村旅游资源,从而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增值。因此,要立足特色民俗文化,探寻“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借助独特风格的乡村资源和民俗文化,挖掘乡村田地和农产品等重要资源,打造特色农旅品牌,提高乡村传统文化艺术的曝光度、文化内涵和服务质量,并通过“文化艺术+乡村元素”模式促进农文旅交叉融合。比如,四川省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坚持生态农业与文旅商贸融合,打造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明月村依托邛窑文化资源和茶、竹产业基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引进“3+2”读书荟、夏寂书苑等公益机构,并依托镇文化站、文创院落等开展陶艺培训、书画培训等公益文化旅游活动,促进了原生态乡土文化与外来新村民创作展示交流互动。同时,明月旅游专业合作社的成立,统筹了项目资金规划和利用,带动了明月村乡村旅游发展。

(2)产业链纵深融合模式。产业链纵深融合模式以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全产业链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造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农业全产业链开发模式。因此,要加快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全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支持县域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聚焦重点农业产业,推进建设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农业特色小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持续发挥机械化、数字化、组织化、品牌化对农业全产业链的赋能作用。比如,安徽颍上县陈桥镇充分结合稻米产业和区位优势,推动稻米产业全链条发展,实现稻米产业“绿色蝶变”。在产业链布局上,聚焦现代要素集聚、产业融合发展等任务,建设加工集群培育、物流商贸提升等工程,融合生产、加工环节,创建以稻米为主导产业的颍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科研+示范+推广”三结合和“市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全产业链融合的现代稻米生态产业化发展格局。

表13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结果		
	(1)直接效应	(2)间接效应	(3)总效应
<i>Fusion</i>	0.0188*** (0.0011)	0.0457*** (0.0050)	0.0644*** (0.00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Likelihood-ratio test (sar nested in sdm)		429.94***	
Likelihood-ratio test (sem nested in sdm)		433.00***	
Wald test (sar nested in sdm)		428.84***	
Wald test (sem nested in sdm)		416.62***	
Hausman test		65.29***	
ρ		0.2155***(0.0161)	
σ^2		0.0001***(0.0000)	
R^2		0.4231	

N=26752

(3)三产业交叉融合模式。三产交叉融合模式以农产品终端消费需求为导向,实现三次产业之间的优化重组、整合集成、交叉互渗,从而加快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实现农产品“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进而构建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从初级产品到终端消费无缝对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要打造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立足农村、贴近农民集多种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消费微中心,持续提升数字化水平,赋能共同富裕。例如,重庆彭水县桐楼乡桐木村依托天然生态优势,积极开发了“农业+电商平台”的新模式。彭水县沐晖种养殖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为当地村民脱贫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合作社依托天然的生态资源区位优势,打造出一批无任何化学物质的高品质有机绿色食品,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并且通过“二维码追溯机制”解决了消费者的信任问题。同时,合作社还建立了“沐晖生态农园”,通过微信小程序、淘宝等电商平台进行线上产品售卖,不仅破除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困境,还极大地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打开了高品质生态农产品的销路。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6—2021年167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县域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双门槛效应,且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非线性特征,其中,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0.0171和0.2935之间时达到最大。第二,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类型差异。第三,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引培来促进共同富裕,但只有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大于第一门槛(0.0171)时才成立。第四,空间效应识别检验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能显著促进临近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充分发挥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目前全国县域整体表现为随着城乡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其能显著促进县域共同富裕。因此,一是要加强城乡产业融合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尤其是要增加交通、能源、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二是加快推进以特色产业为基础的融合发展模式,立足本地资源和地方特色和文化遗产的产业,有侧重地支持收益高且持续性强的优势产业,以改革创新思路推进农村产业的结构性改革,开辟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加强金融扶持和企业引培,打通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渠道。一是要加快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拓展多元化金融服务,增强保险保障服务能力,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发展,助力农民创业、就业和增收。二是要充分了解当地的优势产业、资源禀赋和经济状况,制订具体可行的招商计划,并持续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推动高科技企业选址下沉至区县,助力县域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各区县要加快区域产业合作与分工,打破乡镇行政局限,实现县域产业在空间上的融合并不断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溢出效应,形成产业聚合和产城融合的发展格局。

第三,制定差异化城乡产业融合政策,并探索差异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模式和路径,避免采取“一刀切”。其一,对于东部和中部县域,要在巩固成果、发挥区域、人才、科技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经验,打造县域共同富裕示范引领区;西部县域加快产业发展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根据地理、气候、资源和物种条件,加快培育旅游、矿产、特色农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东北县域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延长产业链、发展产业群,形成县域城乡三产搭配和融合的新格局。其二,均衡成熟型和动力追赶型县域要持续发挥城乡产业融合带动共同富裕的比较优势;高速成长型县域要在加强市场监管、建立产权保护机制的同时,建立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满足高速发展的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大量要素需求;潜力优势型和融合起步型要建立健全市场、合作、互助和扶持机制,在学习借鉴高水平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成功经验的同时,充分利用政策便利,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加快产业升级与创新,助推共同富裕。

参 考 文 献

- [1] 张来明,李建伟.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J].改革,2021(9):16-33.
- [2] 王博,王亚华.县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内在逻辑、驱动机制和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2(12):73-81.
- [3]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6.
- [4] 师博,胡西娟.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J].改革,2022(8):76-86.
- [5] 龚斌磊,钱泽森,李实.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12):5-26.
- [6] 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J].经济研究,2022(7):84-100.
- [7] 徐鹏杰,张文康,曹圣洁.产业结构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经济学家,2023(5):78-88.
- [8] 王轶,刘蕾.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中国农村经济,2022(9):44-62.
- [9] 林嵩,谷承应,斯晓夫,等.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23(3):40-58.
- [10] 孔祥智,谢东东.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2-22.
- [11] 易醇,张爱民.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城乡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模式研究[J].软科学,2018(4):105-109.
- [12] 任迎伟,胡国平.城乡统筹中产业互动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8):65-75.
- [13] 张子珍.中国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影响[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5):92-103.
- [14] 魏博通.中国城乡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J].农业经济,2022(2):93-95.
- [15] 张军.城乡产业融合的规律、平台与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18(8):31-36.
- [16] 周孟亮,陈文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21-127.
- [17]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管理世界,2022(1):52-61.
- [18] 姜长云.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与乡村产业振兴[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1.
- [19] 崔树强,周国华,吴国华,等.空间交互视角下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城乡融合度评价及其驱动机制[J].地理研究,2023(4):1029-1049.
- [20] 王松茂,尹延晓,徐宣国.数字经济能促进城乡融合吗: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例[J].中国软科学,2023(5):77-87.
- [21] 李晓龙,冉光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双重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9(8):17-28.
- [22] 王丽纳,李玉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分析[J].改革,2019(12):104-114.
- [23] HUANG B, LIAO X. Research on the market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regions[J]. Converter, 2021(4):490-495.
- [24] 郭军,张效榕,孔祥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案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9(3):135-144.
- [25] 申云,王锐,张海兵,等.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变迁[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60-72.
- [26] 李晓龙,冉光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基于省际异质性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9(3):86-93.
- [27] 朱信凯,徐星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对策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9-12.
- [28] 李乾,芦千文,王玉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的互动机制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8(4):96-101.
- [29]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 [30] 佟伟铭,郭加新,徐维祥,等.县域视角下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地理研究,2023(6):1577-1597.
- [31] 于斌斌,郭东.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效率:理论与实证[J].经济问题探索,2021(7):148-164.
- [32] GREINER A, KAUERMAN G. Debt policy in euro area countries: evidence for Germany and Italy using penalized spline smoothing[J]. Economic modelling, 2008, 25(6):1144-1154.
- [33] 胡耀岭,徐洋洋.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共同富裕效应[J].人口与经济,2023(4):106-123.
- [34] 杨文进.资本积累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最有效手段——论“资本逻辑”的真正涵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72-184.
- [35] 陈湘满,喻科.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66-73.
- [36] 郝大江,张荣.要素禀赋、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J].经济学家,2018(1):41-49.
- [37] ANSELIN L, BERA A K, FLORAX R, et al. Simple diagnostic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96, 26(1):77-104.
- [38] ELHORST J P.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14, 37(3):389-405.

Promoting Revitaliza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unty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GUO Dong, LI Lin

Abstract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1672 coun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1, we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e of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of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its channels of act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using the threshold model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county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has a positive U-shaped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es show that the county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a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fostering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but this is only effective when county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s to a certain degree.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county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show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t both the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ype level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county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unties need to adopt appropriate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mode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unty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ptimize th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strengthen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enterprises, optimi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explore differentiated modes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ounty common prosperity; enterprise training; financing constraint

(责任编辑:王 薇)